乡村社区复兴的两种模式：韧性视角下的启示与思考

Two Models for Revitalizing Village: Enlightenments Under Resilient Perspective

颜文涛 卢江林
Yan Wentao, Lu Jianglin

摘要: 从韧性视角评析绅士化和草根化的乡村复兴模式, 对更好地理解韧性概念、引导韧性构建和韧性规划、反思乡村如何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解析韧性概念内涵的基础上, 对绅士化的宏村和草根化的桃米进行对比评析, 认为草根化模式比绅士化更具韧性, 更具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韧性视角得到乡村社区复兴的四点启示: 韧性社区构建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力更生”; 相对于大事件更注重微小渐进式的韧性培育; 适应性学习和创造力培育是韧性构建的关键环节; 社会网络建构是韧性构建的核心要素。延伸至规划领域, 笔者认为韧性规划需要生态智慧“善”的价值指引, 并在挖掘、学习、创新、延续当地生态知识的过程中, 完成“实践—知识—智慧”的良性循环。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wo models of revitalizing village under resilient perspective, it is important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oncept, guiding the resilience building and resilience planning, reflection of rural revitalizing. On the basis of analytical concept of resilience,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 analysis of gentrification and grassroots. We found that grassroots mode is more resilient than gentrification, which have more abil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ed up four enlightenments for resilience building, the resilienc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s far from “self-dependenc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silience of small incremental cultivation relative to the big event; the cultivation of learning abilities and creativity is the core section of resilience construction, the individual resilience and entire social networks’ resilience are the core elements of resilience construction. Then, extends to urban planning area, this paper holds that resilience plan needs the guidance of “permanent good” from ecological wisdom, an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excavate,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continue the local knowledge, finish the virtuous circle of “practice-knowledge-wisdom”.

关键词: 乡村社区; 复兴模式; 绅士化和草根化对比; 韧性发展

Keywords: Village Community; Revitalizing Models;

Comparison of Gentrification and Grassroots; Resilience Development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2017YFC05057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1278504)
共同资助

作者: 颜文涛 (通信作者),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教授;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生态智慧与生态实践研究中心副主任。yanwt@tongji.edu.cn
卢江林,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博士研究生

引言

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使乡村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当代乡村消费化是城市需求推动下的产物, 本质上是乡村空间的资本化现象, 由此带来的是乡村空间的异化, 而非真正的乡村复兴^[1]。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是乡村复兴重要的社会空间载体, 面对现代性导致的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2], 乡村社区发展面临着困境和机遇。如何抉择是个难题, 是积极地引入资本以快速发展乡村经济, 摆脱贫穷衰落的泥沼? 还是努力寻求基于地方独特性的自我经营模式? 如何抉择没有标准答案, 区别在于价值评判标准和发展愿景的不同。作为地方的乡村社区需要长久和持续的发展, 而不是昙花一现。在面临 (未来不可避免的) 不确定事件的冲击时, 可能又将陷入新的困境, 乡村社区是否可以拥有持续的适应和转变能力?

韧性为实现可持续目标提供了新思路和创新途径^[3,4]。目前韧性研究多数集中于应对灾害的韧性构建^[5], 多从城市和社区两个层面来讨论。对于社区韧性的构建也逐渐从物质环境转移到关注社会和人的作用, 社区居民成为社区韧性的研究主体, 但是多数研究为灾害韧性的评估方式、指标和研究框架^[6]。对乡村社区韧性的讨论还较少, 有学者从“恢复力”的角度讨论了乡村社区的空间演变与重构^[7]。从韧性的概念可以看出, 灾害只是一种扰动较大的变化, 而当前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变化, 可能对乡村社区产生更为强烈和持续的影响。对乡村社区韧性的讨论, 从单一灾害视角转向综合视角, 探讨乡村社区的总体适应和发展转变能力, 可为乡村复兴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笔者选取的两个乡村社区——绅士化的宏村社区和草根化的桃米社区, 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 都完

成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转型。两个社区都在 2000 年左右开始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旅游业的转型，基于不同的发展本底，选择了绅士化和草根化两种不同的复兴模式，至今已有近 17 年的发展历程。从韧性的概念——“系统为回应压力和限制条件而激发的一种变化（Change）、适应（Adapt）和改变（Transform）的能力”^[8]——来看，它们无疑都是成功的。但是面向更远的未来，两种模式是否拥有不同的转换和发展能力？尝试回答这个疑问，笔者从韧性视角对比评析两个乡村社区的差异，试图探讨造成差异的深层次原因，进而提出乡村社区韧性构建的路径启示。

1 概念解析

1.1 韧性概念的两次范式转换

韧性概念从工程韧性到生态韧性，再到演进韧性的两次范式转换，有着世界认知观与价值转变质的突破^[9,10]。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都认为系统存在均衡状态，隐含着终极平衡和理想稳定状态的认知观。演进韧性认为不管系统是否受到干扰，内部张力也将导致系统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系统并不存在所谓永恒的“均衡态”，而是在动态过程中不断地转化为“新常态”，认为系统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和自组织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连续性”^[11]。因此韧性不应该被视为系统对初始状态的一种恢复，而是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为回应压力和限制条件而激发的一种变化、适应、和改变的能力^[8]。演进韧性把重点从生态韧性强调的“坚持和适应能力”转变为“转换能力”。如，新奥尔良飓风之后市民并不希望回到原来脆弱的城市状态，而是期望更安全和更好的社区环境^[12]。

1.2 乡村复兴

“乡村复兴”应超越传统的乡村转型路径和表面化的乡村环境建设，存在内外两层基本内涵：外在彰显乡村的独特性，在城乡连续谱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内在流通城乡要素，实现多向度的乡村经济和社会自组织^[13]。“复兴”强调的是在现代语境下重塑乡村耐人寻味、不可或缺的文化传统与独特价值，而不是使其沦为城市的简单附属^[14]。乡村复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乡村内部要素重组和整合，重新恢复乡村的活力与稳定；二是对外形成自己独特的产品或影响力，根据自身差异性定位对城市有主动作用的输出与互动，转变城乡依附的关系^[15]。可见乡村复兴的核心与基础是挖掘和保留乡村自身的独特性，目标是通过实现乡村经济复兴和社会自组织，改变依附的城乡关系。不能从单纯的经济角度衡量复兴，而是应该从“空间—社会—经济—环境”等多重维度来评析乡村复兴的模式和结果。

1.3 乡村社区韧性

乡村是行政范围内的所有地理空间，乡村社区则更强调居住功能和社会组织体系，具有社会—空间双重概念。乡村社区是组织更简单、独立和完整的系统单元，可以更直观地从韧性视角来评析不同模式的发展差异。乡村社区持续发展是乡村复兴的关键载体。乡村社区韧性可以对应韧性“生态—社会系统”的概念语境，体现社区居民活动的主体特征对外界干扰或变化（社会生产方式、居民生活方式、自然环境过程等变化）的适应和创造性转变的能力^[7]，有明确的韧性主体（resilience of what）和韧性对象（resilience to what）。相较于城市社区，我国乡村社区具有韧性构建的天然优势。首先，乡村社区的土地归集体所有，社区居民对环境开发有更多的自主权；其次，乡村社区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熟人社会，具有先天的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16]。最重要的是，乡村社区是人地关系联系紧密的、完整的、地域性的生产生活生态集合体^[17]。

2 乡村社区复兴的两种模式对比

2.1 两种模式的选择：绅士化与草根化

位于安徽省黟县的宏村社区，具有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被誉为“画里乡村”。早在 900 多年前的明清时期，宏村居民就借助自然河道改道的契机，层层递进构建了村落的水网格局^[18]。将自然河道与人工水系结合在一起，既能够预防自然灾害，也满足了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水系得以长久良好运转，离不开徽商的经济支持和宗族的组织管理，这不仅是宏村的标志性特色，也是我国古代传统生态智慧的直接体现。但宏村在 20 世纪末时发展得并不顺利，居民多次尝试经营旅游业都以失败告终。一方面是缘于西堤（临近宏村）优先发展旅游业的冲击，另一方面宏村的旅游产权并不属于社区居民而属于黟县人民政府，居民对自身旅游业的发展没有话语权。1998 年宏村因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吸引了外部资本入驻，外部资本方获得了宏村 30 年的旅游经营权。宏村开始了由强势外部资本主导的快速绅士化发展。

位于中国台湾中部南投县的桃米社区，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无名小村落，由于垃圾填埋场设于此，当地人自嘲为“垃圾里”。当地人以种植竹子维系生存，由于生存现状相当艰难，桃米的人口外流现象非常严重，人口结构老龄化。桃米迎来的转折基于一场灾难——1999 年的“9·21”大地震摧毁了桃米 80% 的房屋。震后的桃米得到了台湾的非营利组织和专家团队的关注，以及政府的赈灾资金（用于社区灾后基本生活秩序重建的应急款项）。没有良好的资源本底，又处于灾难的摧毁下，桃米开始了基于多组织协助，缓慢并充满未知的草根化社区营建历程。

2.2 两种发展图景：快速与渐进

2.2.1 绅士化快速发展的宏村社区

宏村社区利用资本的力量，通过几个大事件的助推，使旅游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2000 年申遗成功，知名电影《卧虎藏龙》在此取景等，使宏村社区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大大提升。同时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在进行，目的在于防止旅游开发对历史遗存产生破坏。这两种力量都对宏村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快速的经济也提升了当地人的生活品质，宏村社区的外部物质空间如公共设施和水质等都得到了很好的维护，至今还能很好地被社区居民使用（图 1）。年游客总数从 2000 年的 8 万人增至 2015 年的 185 万人，旅游收入 1.14 亿^①。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多矛盾和问题：被资本控制的村落公共空间被旅游开发取代，不再具备举办社区公共活动和提升凝聚力的功能；承担着居民日常生活交流的月沼被游客和相机占满，公共空间的传统交流功能被弱化；资本方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加剧，利益分配问题导致多次冲突事件，引发了居民的负面情绪，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隐患。

2.2.2 草根化渐进式发展的桃米社区

桃米社区实践先改变“人”，重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共同体关系，然后再推进实体环境的重建。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重点关注“人的改造与成长”，通过专家团队（台湾淡江大学、台湾中兴大学、台湾特生中心）和非营利组织（台湾新故乡基金）的协助，对桃米社区外部环境资源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桃米社区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

（如物种多样性，台湾共 29 类青蛙，桃米就有 23 种），让村民重新认知和体验周边环境，构建社区的核心价值，通过专业化分工协作，形成专业互助的感情纽带，社区逐渐形成环境共识。如“生态解说员”的职位设定、以户为单位的个性化民宿经营尝试、“以工代赈”、成立社区工班组织“就地营造”、“大家来清溪”等多样化的社区活动（图 2，图 3），重构了社区居民之间协同互助的社区情感。第二阶段为桃米社区生态产业运营阶段，台湾新故乡基金逐渐将事务移交给桃米社区居民，居民的自主能力和社区意识逐渐加强。灾后第三年（2002 年）桃米社区正式成立游客中心，游客人数从 2002 年的 7 889 人增至 2014 年的 54 万人。面向青少年和儿童的生态休闲旅游（如以青蛙栖息地为主题的朔溪活动）和以青蛙为主题的手工艺品逐渐形成桃米社区的主导产业，已经成为社区居民的稳定经济来源之一，是桃米社区发展获得持续动力的源泉。第三个阶段为桃米村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在自主运营之后，桃米社区开始寻求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

图 1 宏村水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2 “大家来清溪”活动

资料来源：<https://sanwen8.cn/p/s75Ce9.html>

图 3 “就地营造”的蛙树亭

资料来源：<https://sanwen8.cn/p/s75Ce9.html>

① 数据来源于宏村镇 2015 政府工作报告。

其中纸教堂形成社区精神纽带，不仅是桃米社区震后的社区精神凝聚力的体现，也是新故乡基金推广台湾社区营造经验的基地。

2.3 两种发展结果：“转变”（transfer）与“进化”（evolution）

宏观社会环境限制了各自的选项，造就了选择的必然性。桃米模式目前来看是成功的，但最初也属无奈之举，居民在灾难的绝望中，对自主营建有迟疑和不确定，是多方外力与居民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今天的局面。最重要的是，台湾具有成熟的社区自主营建的社会环境，如非营利组织和民间融资平台提供的资金支持，社会意识中草根力量和社会自组织的壮大，以及政府对社区自治倡导并提供法律保障（2004年台湾通过了“社区营造条例”来保障社区的自治权力）^[19]。宏村在2000年左右并不具备以上的发展环境，当地人在经历自主开发失败后，如何生存下去是当务之急，大资本的入驻也是幸运的，否则宏村也有可能面临衰败的风险。目前看来，两个村落都成功地完成了在逆境中的转化，从传统农耕型乡村社区转向了现代旅游型乡村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不同的资源开发模式带来了不同的发展结果：宏村利用资本的力量，快速将本地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完成了自身资源与外部资本结合的“转变”（transfer）历程；而灾后桃米在诸多团体共同协助下，有效挖掘长期被忽视又极具独特性的村落环境特质，取得了旅游开发与乡村社区复兴相结合的渐进式“进化”（evolution）历程，原有村落“底色”既是旅游开发的象征与符号，又成了重聚社区的精神内核。

2.4 两种模式对比评析：渐进的草根化模式更具韧性

两种模式都成功完成了转化和发展并构建了韧性，但是却有韧度（capacity of resilience）的高低之分。虽然学界已有韧度的讨论，但还没有统一的韧度量化研究。有学者认为韧度取决于居民的韧性及调动资源的能力^[20]；也有学者从韧度的构建角度指出，规划师除了构建具有韧性的空间环境之外，更要重视适应性的社会机制及有意义的公众参与^[3]。其实都强调了空间环境、社会网络机制以及两者相互关系对韧度构建的决定性作用，笔者将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评析两个社区的韧度。

第一，从物质空间环境来看，宏村与桃米都很好地保护并开发了自身的环境资源。第二，从社会网络发展来看，两者最初都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乡土熟人社会，宏村受到外部资本的冲击，双方形成了较为紧张的关系，也加剧了自身社区内部的社会分化（外部资本方按照社区居民的类型来进行利

益分配）；而桃米则在自主营建的过程中，不断重建和加强原有分散的社区意识和凝聚力，以纸教堂为标志，形成了灾后新的精神凝聚核心，与多方协助组织之间形成了良性的合作关系。第三，从社会网络与环境资源的关系来看，宏村居民对其环境的认知和开发，在外部资本方入驻之后并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因为开发权和决定权不在居民手中，居民无法真正地参与社区产业的发展决策；桃米社区复兴模式将社会网络与环境资源的开发紧密结合在一起，过去的10多年居民通过学习、认知、尝试、经营完成了对自身资源开发利用的历程。

基于以上分析，将眼光投向2030年和更远的未来。宏村与外部资本方的合同将在10多年之后终止，预想2030年左右外部资本方与宏村的合作模式将有几种可能：（1）宏村发展势头良好，外部资本方愿意继续合作，但是宏村以利益分配不均问题中止续约，开始自主经营；（2）宏村与外部资本方达成新的合作协议，以更满意的分配方式继续合作；（3）宏村发展每况愈下，外部资本方主动撤资。不同的状况下，宏村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及对韧度的要求都不一样。由于环境开发与社区居民之间的脱节，社区居民是否有能力应对新的变化并开始新的发展是个疑问。桃米社区居民拥有独立和完善的自治能力及管理系统，有理由相信其有能力面对将来的变化。因此，草根化的乡村复兴模式相比绅士化的乡村复兴模式具有更高的韧度（表1）。

3 乡村社区韧性构建的路径启示

3.1 韧性社区构建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力更生”

在生态学领域，韧性强调的是系统自身的恢复、适应、转变、发展的能力，尽管广泛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培育适应能力并增强韧性，但它不能取代反应迅速、负责任的政府管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和活动，韧性的构建需要政府、居民、资本团体、规划师等共同参与才能实现。从两个案例中也可以看出，桃米社区的韧性构建，虽然由当地居民亲自实践和完成，但也离不开社会多组织的协助，尤其是政府的政策转向及社区意识提升的社会大环境。宏村选择的局限也是由于不成熟的社会环境条件，无法形成多元治理模式。从社会—生态系统管理实践的角度，我们不希望系统崩溃（虽然是可能的），而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发展路径和方式。除了系统本身的努力之外，外界环境能提供的协助与良好的价值引导也是必要的因素。

3.2 相对于大事件更注重微小渐进式的韧性培育

传统韧性实践的研究文献多数关注系统突发的、大型的灾害事件，而忽略了系统渐进的、微小的、积累的变化。灾

害管理固然重要，能够迅速将系统恢复至正常运转的状态；但是系统的适应性学习和管理机制的建立，也不容忽视^[21]。桃米和宏村两个社区的发展，即使没有外部环境的干扰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渐进积累式的韧性培育是保持良好发展的基础。在应对未来的不确定事件中，桃米社区比宏村社区更具转化和发展的能力。

3.3 适应性学习和创造力培育是韧性构建的关键环节

社区从外部干扰完成转化的过程中，适应性学习能力和创造力培育是韧性构建的关键环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居民对自身环境生态知识的认知学习和创新式利用。适应性学习过程是系统反馈调节的前提条件，影响着个体认知和社会行为模式。桃米渐进式的发展模式并没有清晰的路径，是在发展过程中摸索出来的。漫长和不确定的营造历程，给社区居民提供了自主学习、改造环境、不断尝试并积累经验的机会，如社区居民成立社区工班对社区湿地景观进行的改造过程，社区居民对各自房屋进行的个性化重建等，使得居民的创造力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重塑了社区多样化的空间环境（每户权属范围内外部环境都各有特色），建立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协同共生的关系。宏村社区的发展路径是清晰明确的，但限制了居民与自身环境之间学习、适应、创造能力的培育，资本撤资后宏村社区的发展将面临新的困境，是否有能力完成新的转换值得怀疑。但是宏村在明清时期最初构建村落时，却是村民自主筹资、管理、设计、建设了整个宏村的水系和村庄格局，每一个阶段都根据当时的状况作出合理的安排和

调整，包含了宏村居民独特的创造力。然而后期的转型中，其优秀的传统生态实践智慧，在新时期没有得到创造性的延续和转化（图4）。

3.4 社会网络建构是韧性构建的核心要素

灾害韧性是社区或社会利用冲击或压力来改变其非核心属性，完成自我重建从而适应新的状态。社区的个体与之共同构成的社会网络可以被视为社区的核心要素，因为韧性最终要归结于个人和社会网络，物质建设过程是必须的，但它不是使城市或社区复兴并富有韧性的充分条件。草根化的社区复兴模式比绅士化复兴模式更具韧性，是因为重构了良好的社会网络与社会系统。乡村社区韧性离不开良好的社会行为方式，将可感知的社区环境过程与生命体验相结合，可以培育人与自然之间互惠共生关系的契约精神，是调节居民行

图4 两种发展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表1 两种模式的对比评析

对比内容	资本主导型的安徽宏村	社区自治型的台湾桃米
资源	历史文化遗产	自然生态资源
起点	“中国画里乡村”	贫穷落后的“垃圾里”
转折点	2000年申遗成功	1999年地震
发展目标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	生态村
社会背景	经济快速发展，历史文化保护工作起步，非营利组织和民间融资不成熟	台湾社会运动、非营利组织和民间融资的成熟
发展路径	强势外力（营利组织）主导，内力被排挤	外力（非营利组织）辅助，内力为主
改造模式	资本主导 先开发“空间”，“人”处于被动、弱势地位	社区自治 先改变“人”，后营造“空间”
优缺点	优：快速发展当地经济，提高当地人生活质量 缺：居民的参与感缺失，引发社会矛盾，不可持续	优：渐进、自主、可持续 缺：需要较长年限、速度缓慢
管理模式	外部资本主导的旅游管理	社区自主管理
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	社区主体话语权丧失（本地人迁出社区中心），原有精神凝聚力丧失	成功重构本地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
物质空间环境变化	外部资本很好地保持了物质空间原貌，但限制了物质空间有机生长；由于产权和经营权等问题，物质空间与地方社会网络无法有机融合	渐进式、有机而具有创造性的改造，与自然环境良好融合，与地方社会网络密切结合
社会网络	由于公共利益的分配不均，导致社区的居民产生负面情绪，社区的参与和自主管理水平低	良好的社区互助邻里关系，纸教堂成为社区的精神核心
社区精神核心	丧失：乐叙堂已经被资本占有，原有社区精神凝聚力已经丧失	重构：纸教堂重构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核心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为方式的基础。桃米社区发展模式使每个社区居民都参与到社区的重建过程中来，完成的不仅是物质空间的重建，更重要的是重塑了社区良好的社会系统，提升了社区精神凝聚力，产生了维持社区系统功能的内生动力，最终改变的是社区个体及共同组成的生命网络。其最大的特质不是精致的空间，而是社区的生命力，这是社区面对未来变化进行创造式转变的前提，是社区韧性构建的核心要素。

4 延伸思考与讨论：韧性社区需要生态智慧的引导

回应最初提出的问题，乡村社区复兴模式的优劣在于用什么价值标准去评判。基于韧性社区构建的视角，草根化的乡村社区发展模式优于绅士化的乡村社区发展模式。韧性理论为解决可持续悖论（静态的空间环境与变幻莫测的发展环境之间如何可持续的悖论）提供了一种视角和可能的方式，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创新途径，生态智慧为实现“善”的可持续发展的提供价值和行为准则。通过案例对比评析发现，最终造成两种模式差异的是背后价值取向的不同。但由于韧性理论更多的是关注实践行动，不关注价值选择，而生态智慧则为韧性实践提供了价值指引。

4.1 生态智慧为韧性社区实践提供了“善”的价值指引

20 世纪 60 年代后，西方城镇规划范式发生了转变，城镇规划实践决策最根本的是价值判断——判断做什么和如何做好，关于实践思考和判断的理论被认为是城镇规划绝对的焦点^[22]。而生态智慧为城市规划和景观提供了实现长久可持续发展的指引^[23]，最为重要的是价值指引和判断。因为生态实践智慧是作出正确判断和采取正确行动的能力，生态智慧不仅强调通过生态知识来理解人类环境系统，更赞成人类与自然先天的情感归属，可以指引城市规划者和设计者，选择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24-26]。与现代生态科学及相关学科对具有普适性的“真”的追求不同，生态实践智慧是在特定情境下发现相关知识、发明和运用适用技术对“善”的追求，其内涵是选择“正确的”生态知识成功进行“为善的”整体生态实践能力^[27]。

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两个案例，宏村模式的价值取向对于整体经济发展来说是“好”的，但长远来看对环境与居民并不是“善”的，因为它并没有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而宏村本身所具有的优秀传统生态智慧，也没有在绅士化的模式中得到延续与转化。桃米从地震的绝望中，通过渐进式的环境营造，有效地获得实践经验和形成环境共识，逐步实现人一自然的永续共存。最初的发展模式选择对人和环境都是“善”的。因此，对

韧性社区实践的价值引导，将有利于我们以更长远和整体的目标来作出智慧的抉择。生态智慧正是为韧性规划提供了“善”的价值指引。

4.2 韧性社区实践是体现传统生态智慧的途径和方法

韧性规划与生态智慧属于两个层级的领域，韧性规划属于实践领域，生态智慧属于哲学的方法论领域。有学者用二元的观点，将知识和智慧的层级关系划分为“数据—信息—知识—智慧”，而在生态实践活动中，存在着“知识—实践—智慧—新的知识—新的实践—新的智慧”的认知和行动的关系^[25,27,28]。生态智慧为韧性社区实践提供价值引导的同时，韧性社区实践通过体现生态智慧获取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生态智慧追求的是人与环境的动态平衡状态，将社区实践作为整体考虑，不追求单一系统的最优化^[26]。可以将乡村社区所蕴含的传统生态智慧，凝结成现代的实践行动指导原则，为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引。

4.3 韧性规划和培育需要挖掘、学习、创新、延续当地的生态智慧知识与经验

韧性规划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与生态智慧之间有两个转化的环节，将实践转化为知识进而升华为智慧。生态实践智慧强调应该在智慧的行动下进行知识的实践应用，如果没有智慧，知识会被滥用^[25,29]。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也很难达到智慧。所以韧性规划首先需要挖掘、延续和创新当地的生态智慧知识与经验。宏村的水系网络历经 900 年现在依然发挥着作用，它所承载的优秀生态智慧，在资本导向的发展模式下并没有被很好的延续。而桃米却在草根化的进程中，通过生态学者和相关团体的协助，重新挖掘和认知了当地的生态资源，这种环境共识和社区体验是桃米社区发展生态产业的基础，桃米社区建构的社会系统在面对将来的变化时，更有能力作出适宜的选择（图 5）。

图 5 韧性规划与生态智慧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5 结语

从韧性视角评析绅士化和草根化的乡村社区复兴历程,认为韧性概念强调的不仅是恢复力,还是转化力及更好的发展能力。草根化乡村社区发展模式比绅士化发展模式更具韧性,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关联社会网络的社会学习过程和反馈调节机制,影响着个体认知和社会行为模式,可以实现人一自然协同共存的可持续目标。韧性社区实践还需要生态智慧“善”的价值指引,并在实践过程中挖掘、学习、创新、延续当地的生态知识,使之升华为新的生态智慧,并指引新的韧性规划实践。

以两个乡村社区复兴模式作为镜鉴,认为单纯依赖于经济发展的价值判断来衡量乡村复兴水平,可能会导致乡村空间的异化和社会矛盾的产生,甚至磨灭乡村赖以生存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宏村社区在现代资本的冲击下使原本优秀的传统生态智慧逐渐稀释,而桃米社区则在灾难中重塑了现代生态智慧。而如何被稀释?如何再创造?笔者从韧性的视角评析给出了部分的解释。虽然每一个案例都有其特殊性,但是“好”的复兴路径是可以有共性的,这就需要更多的深入调查和实证研究,希望在后续研究中可以继续追溯答案。UPI

参考文献

- [1] 高慧智, 张京祥, 罗震东. 复兴还是异化? 消费文化驱动下的大都市边缘乡村空间转型——对高淳国际慢城大山村的实证观察[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1): 68-73.
- [2]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M].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0.
- [3] Ahern J. From Fail-Safe to Safe-to-Fail: 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 the New Urban World[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1, 100(1): 341-343.
- [4] 邵亦文, 徐江. 城市韧性: 基于国际文献综述的概念解析[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2): 48-54.
- [5] Godschalk D R. Urban Hazard Mitigation: Creating Resilient Cities[J]. Nature Hazards Review, 2003, 4(3): 136-143.
- [6] 杨敏行, 黄波, 崔翀, 等. 基于韧性城市理论的灾害防治研究回顾与展望[J]. 城市规划学刊, 2016(1): 48-55.
- [7] 张甜, 刘焱序, 王仰麟. 恢复力视角下的乡村空间演变与重构[J]. 生态学报, 2017(7): 1-11.
- [8] Walker B, Holling C S, Carpenter S R, et al.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Ecology and Society, 2004, 9(2): 5.
- [9]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 1973, (4): 1-23.
- [10] Davoudi S. Resilience: A Bridging Concept or a Dead End?[J].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012, 13(2): 299-333.
- [11] Berkes F, Folke C, eds. Linking Soc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Social Mechanisms for Building Resilie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2] Campanella T J. Urban Resilience and the Recovery of New Orlean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6, 71(2): 141-146.
- [13] 张京祥, 申明锐, 赵晨. 乡村复兴: 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5): 1-7.
- [14] 申明锐, 张京祥.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乡村转型与复兴[J]. 城市规划, 2015(1): 30-34.
- [15] 赵晨. 要素流动环境的重塑与乡村积极复兴——“国际慢城”高淳县大山村的实证[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3): 28-35.
- [16]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17] 张尚武. 城镇化与规划体系转型——基于乡村视角的认识[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6): 19-25.
- [18] 王浩锋. 宏村水系的规划与规划控制机制[J]. 华中建筑, 2008(12): 224-228.
- [19] 王茹. 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及评析[J]. 台湾研究集刊, 2004(2): 36-42.
- [20] Vale L, Campanella T, eds. The Resilient City: How Modern Cities Recover from Disaster[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1] Rodin J. The Resilience Dividend: Being Strong in a World Where Things Go Wrong[M].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2014.
- [22] Taylor N. Urban Planning Theory Since 1945[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8.
- [23] Yang B, Li S J. Design with Nature: Ian McHarg's Ecological Wisdom as Actionable and Practical Knowledg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6(155): 21-32.
- [24] Schwartz B, Sharpe K. Practical Wisdom: The Right Way to Do the Right Thing[M].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0.
- [25] Liao K H, Chan J K H. What is Ecological Wisdom and How Does it Relate to Ecological Knowledg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6(155): 111-113.
- [26] Wang X H, Palazzo D, Carper M. Ecological Wisdom as an Emerging Field of Scholarly Inquiry in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6(155): 100-107.
- [27] 颜文涛, 王云才, 象伟宁. 城市雨洪管理实践需要生态实践智慧的指引[J]. 生态学报, 2016(16): 4926-4928.
- [28] Ackoff R L. From Data to Wisdom[J]. Journal of Applied Systems, 1989, 16(1): 3-9.
- [29] Ford J, Martinez D.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Ecosystem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J].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00, 10(5): 1249-1250.

(本文编辑: 秦潇雨)